

# 新发展阶段的学术解释

## ——“两阶段理论”的视角

龚 刚\*

**摘要：**经济学中存在着按所有制和生产力区分的各种阶段论，与此同时，经济学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陷阱理论。两阶段理论是从生产力的资源禀赋结构视角结合陷阱理论来研究经济的发展阶段。从两阶段理论的视角，本文对新发展阶段进行了学术解释，特别地，将新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下中国经济的特征与之前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了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出：（1）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2）扩大内需；（3）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

**关键词：**两阶段理论；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6.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已经被广泛认可，但是对其学术基础的讨论却并不多见。例如，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与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在哪儿？新发展阶段有没有学理基础？它与经济学文献中的各种发展阶段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最为主要的是，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本文将基于“两阶段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 一、文献中的各种阶段论

首先，我们将讨论一下文献中的各种发展阶段论。

#### （一）按所有制区分的发展阶段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形态依次可以演进为：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sup>①</sup>马克思进一步把共产主义区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则明确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同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由此我们看到了从所有制视角所区分的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里，有必要说明如下两点：第一，马克思在指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同时并不排

\*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邮政编码：650221，电子信箱：gonggang@vip.163.com。

本文根据博雅大学堂讲座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阅。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592页。

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某些民族和国家可以跨越某一个或几个历史阶段而向前发展,即历史阶段是可以跨越的;第二,马克思认为尽管社会制度具有可跨越性,但是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跨越的(顾玉兰,2003)。

## (二)按生产力区分的发展阶段

西方学者基本上都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区分。

首先是按先进性程度。李斯特(List,1841)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业社会。凡勃仑(Veblen,1899)则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的野蛮时代、未开发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时代。罗斯托(Rostow,1990)的六个发展阶段论也非常著名,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和追求生活品质六个阶段。我国学者周学(1994)也按此逻辑将发展阶段区分为:低收入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中等富裕阶段和高富裕阶段。必须说明的是,此种类型的研究一般缺乏对发展或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种从生产力视角讨论发展阶段的理论则是以产业结构为基本线索。配第(Petty,1690)就预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呈现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而产业重心也逐渐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这一论述成为后期的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源泉。通过比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三类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数据,克拉克(Clark,1940)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后人将这一研究成果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后来也得到了许多其他研究的支持。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第三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和全要素生产力低下的产业,因此,第三产业的扩大并不一定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均GDP的增长。此外,尽管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都很发达,所占的比例通常在70%以上,但更高的第三产业比例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发达程度,例如印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等国的第三产业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很难说它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也高于中国。

更为流行的从生产力视角去讨论发展阶段的理论则出现于相关的经济增长文献中。经济增长理论一般是根据要素禀赋的演变来区分发展阶段的。生产要素一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而各种要素禀赋结构比例的演变就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索洛(Solow,1956)的增长理论是以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结合来描述经济的增长过程,这是最为经典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然而,它所描述的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而劳动力和技术则被外生给定,而且模型中并没有提到土地。新增长理论建立在索洛的增长理论基础上,但对其中的一项生产要素,即技术进行了内生化的处理<sup>①</sup>,但仍然没有引入土地。这实际上意味着:无论是索洛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认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化的经济社会中已经不再重要。然而,在工业化之前,土地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汉森和普雷斯科特(Hansen and Prescott,1998)构建了一个含有一种商品和两种技术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一种技术即所谓的马尔萨斯技术,是将劳动力和土地相结合,形成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之前的发展阶段;第二种技术即所谓的索洛技术,则是将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由此通过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将马尔萨斯阶段与新古典增长阶段建立了联系。盖勒和威尔

<sup>①</sup>新增长理论对技术的处理分为两类途径:卢卡斯(Lucas,1988)将技术视为人力资本,从而将其镶嵌于劳动力之中;罗默(Romer,1990)则将技术视为知识资本,由此将其镶嵌于资本设备之中。

(Galor and Weil, 2000)通过建立“统一增长模型”,统一了马尔萨斯技术和索洛技术,将发展阶段区分为马尔萨斯阶段、后马尔萨斯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

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以要素禀赋结构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可以与按先进性程度和按产业结构所区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例如,如果要素禀赋结构体现为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其先进程度不高;而当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成为主要的要素禀赋结构时(特别是当技术也引入时),经济社会就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其先进性程度必然较高。

### (三) 陷阱理论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发展阶段理论并没有涉及阶段转化所可能出现的障碍以及跨越这些障碍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体向下一个阶段发展并不顺利,这意味着发展阶段之间有可能存在着陷阱。经济学文献中目前所研究的陷阱基本上有两类:一是贫困陷阱,即当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时,经济体所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只能用于消费,以维持基本的生产状态,从而缺乏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由此,经济长期陷入贫困(Nelson, 1956)。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高于前沿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其增长动力开始减弱,从而使得其人均GDP与前沿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比例再也不能缩小(Gill et al., 2007)。

与陷阱理论类似的观点有刘易斯拐点(Lewis, 1954),它是指剩余劳动力消化或接近消化,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利润减少,从而资本有可能外逃,这样经济就陷入了停滞。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 1964)进一步将刘易斯拐点分为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力从无限剩余转为有限剩余,第二个转折点是剩余劳动力被完全消耗殆尽。刘易斯(Lewis, 1972)本人也接受了将拐点扩展为两个转折点,但同时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体系”。

蔡昉(2013, 2015)将要素禀赋理论和陷阱理论相结合,将东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格尔茨内卷化阶段、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转折点阶段以及索洛新古典增长阶段。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发展阶段最为完整和精确的划分。

## 二、两阶段理论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两阶段理论”。“两阶段理论”由龚刚在200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种声音》一书中首先提出,并在2012年前后曾多次反复强调(参见龚刚, 2012a, 2012b; Gong, 2012, 2013; 龚刚等, 2013),它同样是根据资源禀赋结构并结合陷阱理论来研究发展阶段的。然而,“两阶段理论”并不涵盖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它只是讨论当经济社会走出了贫困陷阱使得积累工业资本成为可能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两阶段理论”目前已经具备了数理模型和初步的实际数据支持。<sup>①</sup>

### (一) 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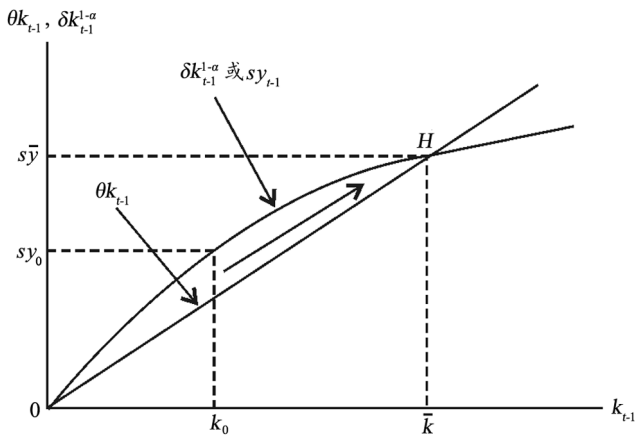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两阶段理论”的初始条件是一个国家刚脱离贫困陷阱,从而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当一个国家刚脱离贫困陷阱时,其要素禀赋结构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人均拥有的资本存量很低。在现实中,这就体现为绝大多数的劳动力仍然与土地相结合,而非与资本相

<sup>①</sup>有关的数理模型请参见Gong(2016)和龚刚(2020),有关的数据支持请参见刘铭(2021)。

结合,从而经济社会本质上接近农业社会,尽管资本积累已经开始,或工业化过程处于初级阶段。第二,农村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耕作所需的必要劳动力远远大于实际劳动力。事实上,斯密将没有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力称为无用劳动,这就是刘易斯剩余劳动力概念的雏形。第三,总体技术水平低下。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刚刚脱离了贫困陷阱时的资源禀赋结构。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个刚脱离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是怎样发展的。斯密(Smith,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大途径:第一是资本积累,第二是加强劳动分工。在现代语境下,资本积累通常是由投资来完成的,加强劳动分工可以理解为技术进步。斯密的这两大途径完全可以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得以解读。

首先是资本积累。城市不断地投资和开工建厂,从而使资本不断积累,资本的不断扩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即劳动力脱离土地与资本相结合,由此我们看到人均资本存量上升。就整个国家而言,生产方式就体现出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带动着人均产量不断上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也就是斯密所言的资本积累过程(见图1)。



注:这里,生产函数为 $Y_t = (AL_t)^\alpha K_{t-1}^{1-\alpha}$ ,  $\delta = \frac{sA^\alpha}{(1+n)^{1-\alpha}}$ ,  $\theta = \frac{d+n}{1+n}$ 。详细推导和解释请参见龚刚(2017),第八章。

图1 增长模型中的资本积累:技术A不变

根据增长理论,这样一个增长过程有所谓的不动点(即图中的H)。这一不动点意味着,如果技术不变,那么由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存在着极限 $(\bar{k}, \bar{y})$ 。此时,如果经济要进一步增长,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来形成新的不动点 $H^*$ (见图2)。

图2表明,在原有的不动点H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人均资本,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即技术从A进步到A')才能实现。尽管这一过程看上去仍然是资本密集化,或仍然是人均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但这时人均资本的提高必须以技术进步为前提条件,即投资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技术必须体现为技术进步。如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技术不能体现为技术进步(即只是简单重复现有技术),在现实中就有可能形成产能过剩。由此我们看到,这种表面上的趋资本密集化实际上是趋知识密集化。总之,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不断提高的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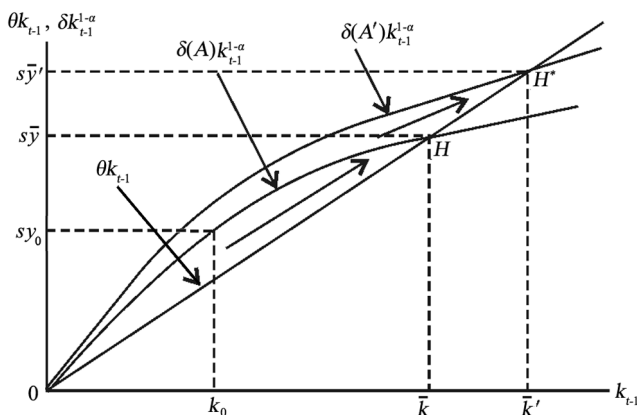


图 2 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  $A' > A$

## (二) 拐点、增长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经济学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拐点理论,前文所述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与资本相结合,从而剩余劳动力由过剩逐渐转向短缺,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而工资的快速上升当然要侵占资本利益,形成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发展经济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拐点,即库兹涅茨曲线拐点(Kuznets, 1955):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必须说明的是,两个拐点所代表的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同一种状态。在发展初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或者说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使得工资的上涨速度缓慢,从而使工资性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不断下降,收入分配持续恶化,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之前的状态。然而,随着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消化,刘易斯拐点出现,工资的上升会相应加快,从而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开始缓解,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也开始出现。由此我们看到,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代表着同一种状态。上述发展过程的动态演变实际上是可以数学模型而予以证明的<sup>①</sup>。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上述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动力和与此相关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了贫困陷阱之后,往往会经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例如,增长率达 8% 以上,远高于前沿发达国家(前沿发达国家增长率一般为 2%~3%),从而很快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陷阱后所经历的现象,这实际上意味着发展初期经济增长动力非常充沛。这里的生长动力既包括消化剩余劳动力,使无用劳动力变有用,同时也包括技术进步。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都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即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是因为投资了大量的工厂,吸引了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工作;技术进步(或形成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是通过投资来完成的。

然而,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化,经济增长的动力会随之减弱。首先,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唯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继续推动人均产量的增长,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只能依靠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剩余劳动力,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减弱,但这仅仅是第一层次的减弱。其次,技术进步可以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在发展初期,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太大,因此,引进技术较为容易,而引进的技术

① 参见龚刚(2020)和 Gong(2016)。

往往是发达国家本身不需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与前沿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缩小,技术引进的空间将会走到尽头,这就是第二层次的减弱。中国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由于美国的封锁,技术引进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总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技术引进空间的缺失使得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此时,唯有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才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包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大量的科研经费。此外,自主研发本质上是和发达国家竞争,不仅风险巨大,同时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胆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是与印度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这无疑是相对容易的。但现在我们要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事实上,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而这正是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即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后,其增长动力的减弱使得其人均 GDP 的增长再也不能高于前沿发达国家,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现象。

事实上,简单的数学推导也可以让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定理:如果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小于甚至等于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发展中国家终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龚刚等,2017)。

(三) 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对脱离贫困陷阱后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无论是刘易斯拐点,还是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或者说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其中拐点和陷阱是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当然两个阶段是部分重合的(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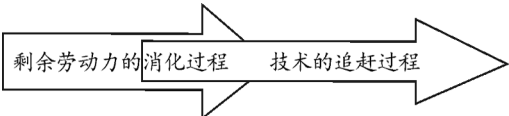


图3 脱离贫困陷阱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特征(见图4)。

| 特征       | 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新常态)    |
|----------|--------------|--------------|
| 基本特征     | 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   | 技术的追赶过程      |
| 生产方式特征   | 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 | 从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化 |
| 劳动力市场特征  | 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    | 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    |
| 收入分配特征   | 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   | 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   |
| 发展水平     | 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   | 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   |
| 经济增长动力   | 充足           | 减弱           |
| 常态下的供需特征 | 需求拉动型        | 供给约束型        |

中等收入陷阱

图4 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之特征比较

图4告诉我们,两阶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完成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图4中的最后一项特征进行解释,即如何理解常态下供需特征的转化。首先,什么是经济社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当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不再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时,供给侧主要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构成;而需求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毫无疑问,经济社会的产量既离不开供给也离不开需求,但供给和需求并

不一定相等。这并不像微观经济学中的剪刀叉理论,两者必须相等。宏观上,供给侧仅仅提供着潜在的产出能力;在给定的供给侧情况下,实际的产出仍然由需求决定,但是如果由需求所决定的产量与供给过分接近,通货膨胀就可能加速。因此,供给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而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需求侧来实现。

现在我们对供给侧作为一种潜在产能如何约束经济增长作更详细的分析。如前所述,技术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形式分别镶嵌在劳动力和资本设备中的,因此,供给侧对经济的约束主要来自劳动力的供给和由资本设备所形成的产能。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或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供给侧对需求的约束只能来自资本设备所形成的产能,但产能却是由投资所积累的。在发展初期,投资一般是极度高涨的,就像在中国,投资增长率远远大于 GDP 增长率,因此,供给侧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任何约束,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由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拉动的。但是,当经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不复存在,于是,供给侧将因为劳动力短缺开始对需求的实现形成了约束。此时,需求所能拉动的有可能并非经济增长(或增长不够显著),而更可能是通货膨胀。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当劳动力紧缺时,工资上涨会非常快,中国目前就进入工资上涨非常快的阶段。由于工资本身是物价的组成部分,因此,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加速。而当通货膨胀加速时,国家自然会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加。由此我们看到供给侧是如何因劳动力短缺来约束经济增长实现的机制。

总之,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或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常态转向供给约束型意味着供给侧对需求的约束将变得越来越显著,尽管经济增长的实现仍然需要通过需求侧来拉动。供给约束型经济实际上也是后文谈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四) 两阶段理论与其他阶段论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两阶段理论与前面所讨论的各种阶段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首先,两阶段理论也是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结合陷阱理论来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但两阶段理论并不涵盖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它只涉及脱离贫困陷阱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表 1 给出了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两阶段理论与其他阶段论之间的比较。

表 1 两阶段理论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的各种阶段论之比较

|              |               |          |               |          |            |
|--------------|---------------|----------|---------------|----------|------------|
| 索洛和新增长理论     |               |          | 新古典增长阶段       |          |            |
| 两种技术增长理论     | 马尔萨斯技术        |          | 索洛技术          |          |            |
| 盖勒和威尔的统一增长理论 | 马尔萨斯阶段        | 后马尔萨斯阶段  | 现代增长阶段        |          |            |
| 刘易斯的转折点理论    |               |          |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 刘易斯转折点阶段 | 新古典增长阶段    |
| 蔡昉的五阶段理论     | 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    | 格尔茨内卷化阶段 |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 刘易斯转折点阶段 | 新古典增长阶段    |
| 龚刚的两阶段理论     | 贫困陷阱:无限的剩余劳动力 |          | 剩余劳动力消化(第一阶段) | 中等收入陷阱   | 技术追赶(第二阶段) |

这里,我们只讨论两阶段理论与刘易斯的转折点理论和蔡昉的五阶段理论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两阶段理论看来,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之后经济社会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与刘易斯认为的转折点(或拐点)发生于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之后的理论是一致的。尽管刘易斯并没有将转折点(或拐点)看成中等收入陷阱(因当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还没有被提出),但刘易斯也认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资本利润减

少,从而使经济陷入停滞(陷阱)。蔡昉(2015)则讨论了刘易斯转折点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对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增长阶段的理解上,两阶段理论与刘易斯的拐点理论和蔡昉的五阶段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刘易斯的拐点理论还是蔡昉的五阶段理论,都是把技术追赶阶段或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发展阶段看成新古典增长阶段,但是,从前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阶段理论认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就是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完全可以由索洛的新古典增长过程来进行描述。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补充一下,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赶超”的概念,这实际上意味着就走在前沿的发达国家而言,其发展过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去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现象时,就没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概念。然而,当我们用同样的理论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现象时,就不能否认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三、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两阶段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为此,我们首先考察中国大约是在什么时刻走出贫困陷阱的。

(一)走出贫困陷阱和进入高增长的第一阶段

如前文所述,所谓贫困陷阱,本质上就是指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还没有达到临界点,缺乏用于发展过程所需的资本积累,从而无法脱离贫困。按照 Nelson(1956),要脱离贫困陷阱必须要越过一个门槛或者临界点,在短期内大量投资,即投资的规模需要有一个下限。我们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投资数据(见图5)。我们选取了部分省(市)的投资,因为全国性的投资数据是找不到的。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之前,投资规模尽管呈现出波动,但并没有明显增长的迹象。但是1978年特别是1982年以后,投资规模加速上升。所以中国脱离贫困陷阱是在1978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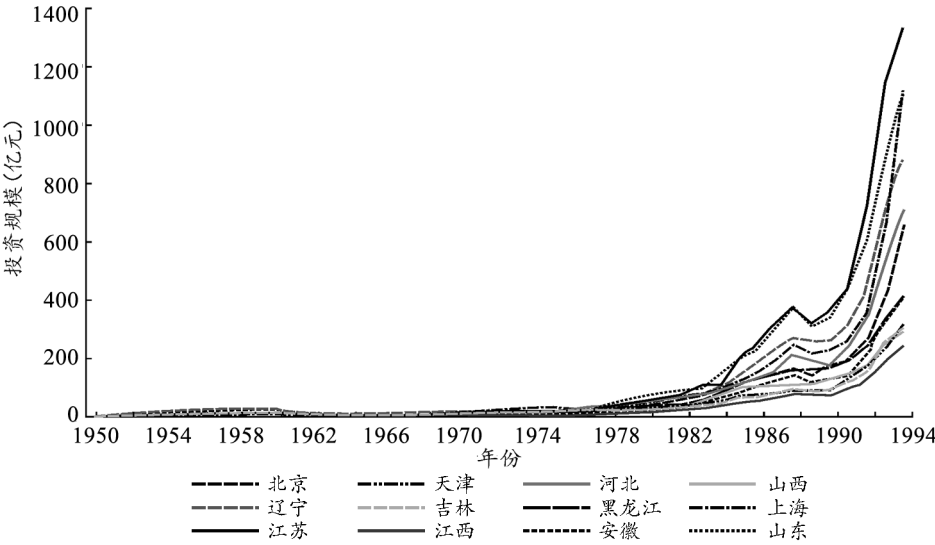


图5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省(市)投资规模(1950—1994年)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中国是如何走出贫困陷阱的。既然是个陷阱,那就意味着通常的市场经济手段是无法走出的。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有大量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



等地的国家)都陷入了贫困陷阱。走出贫困陷阱有两条途径:第一是寻求外部援助,世界银行的建立就是为了帮助贫困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尽管其成效并不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则帮助了美国的许多盟友,如韩国和日本等,走出了贫困陷阱。中国实际上是采用了另一种途径,那就是通过计划经济和城乡分制强行降低本国居民(特别是农民)的生存水平,并逐步积累工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一无是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sup>①</sup>

尽管前30年的计划经济为中国积累了一定的工业资本(特别是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等),从而为走出贫困陷阱打下了物质和工业基础,但传统的计划经济本身也有弊病,那就是缺乏激励。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释放了人们的欲望,从而是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上的转型,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连续四十多年高速增长的轨道。

中国成功走出贫困陷阱,并且快速完成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凸显了与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等)的重要性。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了吗?

那么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首先,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无疑是以中国经济转向供给约束型经济为其逻辑起点。第三,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确实已不复存在。必须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判断目前还有一定的争议,但现实中,招工难这一情况早就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时出现。有关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到4000多万。也许有人会认为,4000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因为好多国家人口也不到4000多万。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4000多万的剩余劳动力所形成的中国整体失业率水平大约是6.6%(徐文舸,2015)。这样一个失业率水平已经接近(甚至低于)西欧的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等。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剩余劳动力不复大量存在也必然意味着工资的加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出现了逆转,或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图6给出了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比例的动态轨迹。最后,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如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连续25年占据世界第一,产能过剩也通常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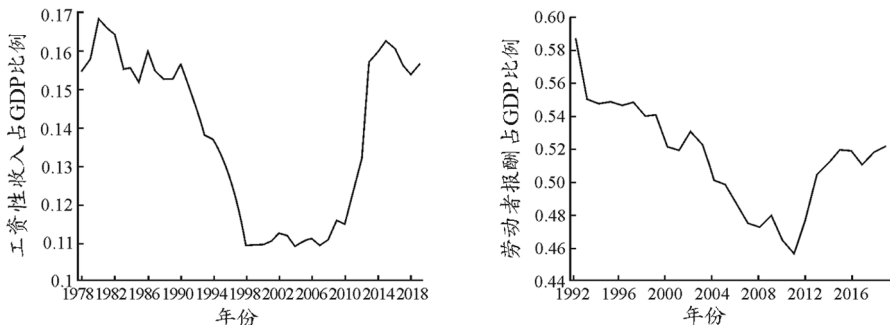


图6 工资性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sup>①</sup>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3:《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

（三）中国大约是在什么时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

如图 3 所示,两阶段完全有可能是重合的,这意味着当中国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就已经开始有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中国很早就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的技术。技术进步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减缓剩余劳动力的消耗速度。然而,中国通过超高速增长的投资使得由资本积累所吸收的剩余劳动力远远大于通过技术进步所释放的劳动力,从而使得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当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大量过剩,中国才正式进入新发展阶段(或两阶段理论视角下的第二阶段)。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大约是在 2012 年前后。首先,2012 年中国经济正式告别了“保八”,此后更是一路向下。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2021 年又回到 8% 以上,但这应该是外生冲击造成的,是对 2020 年受疫情冲击的回弹。许多学者也是根据中国 GDP 增速“破八”,并且一路向下来判断新发展阶段的。<sup>①</sup>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出现在 2012 年前后,这实际上意味着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是在 2012 年前后(见图 6)。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迹象,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中国也是发生在 2012 年前后。图 7 给出了中国纺织业的出口和从业人员动态演变。可以看到,无论是出口还是从业人员,中国的纺织业在 2012 年前后均达到顶峰,此后便一路下降,而推动这一下降趋势的背后则是中国的纺织业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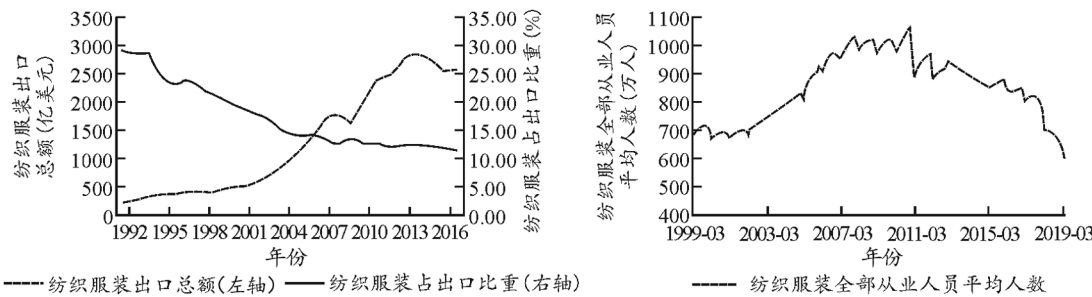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纺织品行业的出口和从业人员

(资料来源:参见“新财富网”,<http://www.xcf.cn/article/4b7bde7a8e7911e9bf6f7cd30ac30fda.html>。)

四、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新发展阶段必然意味着生产方式需要转型,如果不转型,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生产方式错配”。当然,按照政治经济学,这里的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sup>②</sup> 高质量发展无疑是新发展阶段下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然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应该包括哪些内涵? 接下来我们将以两阶段理论为基础,从新旧发展阶段之间经济特征的比较出发,讨论新发展

<sup>①</sup> 参见洪银兴(2014)、金碚(2015)以及简新华和郭洋志(2015)等。  
<sup>②</sup> 参见“人民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阶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

### (一) 追求中高速增长

首先应该降低增长率目标。为什么要降低增长率目标?我们已经知道: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大量存在,此时唯有技术进步,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途径来推动经济增长,即增长动力减弱。增长动力的减弱在现实中表现为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强,所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是为了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之间的关系。

然而,适当降低增长率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以较高或中高,如6%左右的速度增长。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大约在6%左右,近期内中国应该要“保六”。为什么这么说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技术水平等仍然是偏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例如,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和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中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空间。正因为如此,“保六”应该是可以的,至少在最近两三年内。

### (二) 双循环背景下的扩大内需——从需求侧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第一阶段需求拉动型经济中,外需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中是增长最为强劲的,特别是刚加入WTO那一段时间,外需增长率一度达到20%左右。宏观上,出口是需求的源头之一,中国过去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战略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总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外需。微观上,外商通过订单为中国企业解决了资本循环中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困难的环节——卖,然而,外需却同时主导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掌握了中国企业的命脉。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许多企业是以出口美国换取美元为荣,殊不知这样一种依赖也必然意味着“美国生产纸币,中国生产商品”。

也许,在发展初期中国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依赖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然而,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从需求拉动转向供给约束,供给侧已经约束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积累了天量级的外汇储备,其规模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同时,中国对外汇的需求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迫切,例如,中国可以用人民币从伊朗进口石油;当然,最为主要的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已越来越激烈。此种情况下,中国还应继续将自己的企业和经济的命脉交由它国掌握吗?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强调“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由于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此,双循环本质上就意味着扩大内需。在双循环背景下,扩大内需实际上就是要将资本和产业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面向国内市场,逐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于是,扩大内需可能吗?

中国有14亿人口,内需市场潜力无限。在外需已经不再可以依赖的情况下,支撑中国足够增长的重担就落到了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上。中国首先应启动消费,即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事实上,中国启动消费是大有可为的: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实在太低,一直没有超过56%。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中国周边和与中国文化、消费习惯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次,中国应该采用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除了释放更多的流动性之外,中国人民银行更应厘清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使贷款以更低的利率成本进入实体企业以促进民间投资。此外,中央

政府拥有巨大的发债空间,其国债占 GDP 的比例大约只有 20%,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 100%以上——尽管地方政府和民间债务问题十分严重,为此,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发行国债以加强基础设施和新基建等项目的建设。当然,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是没有边际,这里的边际主要是看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非其他。

### (三)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

我们已经从需求侧讨论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现其核心在于扩大内需。然而,扩大内需最关键的推动力仍然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中国经济的常态转向供给约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开始提出来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最主流的解释是:“三去一降一补”。但我个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是指:以自主研发和创新为核心内容,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使得经济社会的供给结构体系更为高质和高效,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发展阶段下的扩大内需更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启动消费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任何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益都是递减的,因此人们对特定商品的需求是有限的。然而,人们对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却有着强烈的需求。现实中所出现的“卖肾买苹果手机”<sup>①</sup>现象充分说明了启动消费离不开研发和创新,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样能够促进投资。新技术的运用通常需要投资来实现,例如,新基建中的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技术、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的建设都需要通过投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也需要投资。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启动消费还是扩大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都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美国的技术封锁已经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只能依靠自主研发。若中国的供给侧不能为经济社会不断地提供新的技术以推出新的产品和升级现有的产品,投资和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扩大内需也将难以实现。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必须说明的是,供给侧不仅仅包括生产体系的供给侧,同时也包括金融体系的供给侧、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供给侧。

金融体系供给侧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现实中金融体系供给侧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融资渠道,比如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等,而不同的融资渠道其融资成本(或利率)是不一样的。所谓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就是指各种渠道的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例结构以及由这种融资结构所产生的利率结构。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的结构特征是银行主导型,即商业银行(包括影子银行)的融资,间接融资在各种融资渠道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由于间接融资在所有融资渠道中其债务负担最高,因此,这样一种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更容易给经济体带来金融和债务风险。与此同时,这样一种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也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例如,大量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也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获得的,但在美国,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主要是通过风险投资和股市融资来完成的。此外,大量中国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常常通过银行贷款(甚至是影子银行的贷款)来完成,而

<sup>①</sup>有关报道请参见 <https://tech.qq.com/a/20140924/030264.htm>。



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不仅周期长,同时回报率也非常低(甚至得不到回报),因此,这样一种融资方式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负担。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以系统性降息为目标,逐步减少间接融资(特别是影子银行融资)的比例,提高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

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供给侧包括:财税体制、转移支付体系、扶贫补偿机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等。这些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同时更有助于启动消费。例如,当前中国在收入分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总是高于富人,因此,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启动消费就越困难。此外,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仍然不够健全,“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尚未解决,这就加剧了大多数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对未来的担忧。因此,如果没有完备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启动消费也将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内部环境而言,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这不仅意味着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显著,同时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减弱,只能来自技术进步。但由于经济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是内部环境的第二个特征),因此,中国经济近期内仍然可以有中高速(如6%左右)增长的潜力。就外部环境而言,外需已经不可依赖,从而扩大内需将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然而,无论是启动消费还是扩大投资,事实上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由于引进技术已不再可能(这是外部环境的第二个变化),因此,以自主研发和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包括生产体系供给侧、金融体系供给侧、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推动新发展阶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 参考文献:

1. 蔡昉, 2013:《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第11期。
2. 蔡昉, 2015:《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第7期。
3. 龚刚, 2008:《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种声音》,高等教育出版社。
4. 龚刚, 2012a:《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5. 龚刚, 2012b:《“破八”体现中国迈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理论学习》第5期。
6. 龚刚, 2017:《当代中国经济(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7. 龚刚, 2020:《高级宏观经济学:中国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
8. 龚刚、黄春媛、张前程、陈维涛、赵亮亮, 2013:《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论新阶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动态》第5期。
9. 龚刚、魏熙晔、杨先明、赵亮亮, 2017:《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10. 顾玉兰, 2003:《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2. 洪银兴, 2014:《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第11期。
13. 金碚, 2015:《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14. 简新华、郭洋志, 2015:《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几种误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15. 刘铭, 2021:《从文献和数据看经济发展的二个阶段》,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 徐文舸, 2015:《“新常态”下的供给约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少?》,《人口与社会》第4期。
17. 周学, 1994:《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第5期。
18. Clark, C.G. 1940.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Company.

19. Fei, J. C. H., and G. Ranis. 1964.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A Publica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Homewood, Illinois: R.D. Irwin, Inc.
20. Galor, O., and D. N. Weil.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06–828.
21. Gill, I. S., H. J. Kharas, and D. Bhattasali.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2. Gong, G. 2012.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3. Gong, G. 2013.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a Harroldian Economy: With Evidence from China." *Metroeconomica* 64(1): 73–102.
24. Gong, G. 2016. "Two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DBI Working Paper 62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9341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893418>.
25. Hansen, G., and E. C. Prescott. 1998. "Malthus to Solow." NBER Working Paper 6858.
26.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27.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 139–191.
28. Lewis, W. A. 1972.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Raúl Prebisch*. Edited by Luis Eugenio di Marco, 75–96. Academic Press.
29. List, F. 1841.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30. Lucas, Jr.,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31. Nelson, R. R. 1956. "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5): 894–908.
31. Petty, W. 1690. *Political Arithmetick*. London: Printed for Robert Clavel at the Peacock, and Hen. Mortlock at the Phoenix in St. Paul's Church-yard.
33. Rostow, W. W. 199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 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71–102.
35.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36.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37.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Republished, 1934.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Stage Theory"

Gong Gang

(Institute of Financial Research,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economics, there are various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stage distinguished by ownership or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various trap theories in economics. The two-stage theory studies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ndowment structure of productivity combined with trap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stage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n economic explan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n particular, it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second stage) with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stage (the first stag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1) reducing the target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appropriately; (2)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3)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hrough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words:** Two Stage Development Theory, New Development Stage, High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JEL Classification:** O10, O50

(责任编辑:陈永清、赵婧)